

#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伦理诉求

李鸿祥\*

## <目 次>

- 一. 缺少“伟大的作品”的中国现代文学
- 二. 中国现代文学伦理诉求的结构性缺陷
- 三. 中国现代作家的伦理经验与启示

## 一. 缺少“伟大的作品”的中国现代文学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最令人期待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出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这里所说的“伟大”，除了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之外，一般来说更侧重于文学灵魂震撼力。凡是伟大的文学常常要有一个伟大的灵魂，这个伟大的灵魂可以给文学带来一种超越民族、社会、文化和国家的界限的力量，它能够引起人类的感情认同，也能够普遍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就此而言，伟大的文学要求文学必须具备一种普遍的伦理诉求。

中国文学传统并不缺乏伦理诉求，可以说，伦理诉求就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主宰古代文学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无论是唐代韩愈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还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提出的合乎时代的实际需要，针对时弊而发的“道”，首先要求的就是文学的伦理诉求。中国近现代文学同样也不缺乏伦理诉求。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梁启超正是在伦理道德的立场上来谈论新文学问题的。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篇就指

\*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 副教授

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sup>1)</sup>在他眼里，小说不只是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以开国民智识、改良群治。继梁启超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提倡不同于旧文学的新的伦理诉求。比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都分别指出了新的伦理诉求在创建新文学中的核心地位。他们共同的意识到，旧的文学（包括陈独秀反对的传统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所依赖的基础就是儒家传统道德，而要实现新文学的梦想，则必须抛弃这种道德基础，建立一种“以人的道德为本”的新文学。周作人在其《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中对于这个“人的道德”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特别强调一种建立在普遍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文学，强调文学在伦理精神的平民性，而不是物质或者社会意义上的平民生活或者平民阶层。正如他在解释“平民文学”这个概念时所指出的，“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sup>2)</sup>

但是，这种被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所张扬的伦理诉求尽管使文坛上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却并未出现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不仅如此，同样张扬人的伦理精神，但立足点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的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也仍未创造出令人信服的伟大作品。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伟大的作品并非今天的看法，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1934年郑伯奇在《春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作品底要求》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最早的思考。他在这篇文章中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从现代文学的开端以来到三十年代中期，还尚未有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这是一个让许多作家感到不安的事实。郑伯奇为此发问：“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个问题在当时文学领域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郁达夫等一些重要的作家纷纷介入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讨论中，尽管学者们找出了许多原因，诸如：中国社会变化太快，社会环境不容许，作家之间的门户之见，作家的能力不够，写作经验不足，文

1) 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 《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117页。

化遗产太薄弱，作家缺乏勇气，作家脱离大众生活等等，但是显然这些回答都没有触及到文学的根本，事实证明，二十世纪具有同样这些因素的西方作家却创作出了被称为“伟大”的作品，相比之下中国作家却仍未出现令人信服的伟大作品，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在不断提出同样的问题。

## 二. 中国现代文学伦理诉求的结构性缺陷

中国现代作家不缺乏传统文学的伦理诉求经验，也不缺现代西方文学文本的阅读经验，但何以创作不出可以震撼灵魂的伟大作品？问题的答案常常就在问题的起点上。如果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着一种伟大的伦理诉求的话，那么，当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问的就是，现代文学的伦理诉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注意到，现代文学起先的伦理诉求对象，既非封建旧伦理，也非西方的基督教伦理，而是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提倡的以“自由、民主和科学”为内容的启蒙主义的伦理观。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和解释这种启蒙主义伦理观的过程中，关注的重心却是它的知识性原则，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科学人生观地普遍接受。这当然与中国知识分子“救国保民”的历史任务直接相关，但这种状况却又注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启蒙伦理内涵的接受本质上是知识性的，而非体验性的。所以，我们看到，象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等现代文学的先驱们，尽管意识到了伦理革新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但是，一旦落实到实践之中，他们重视的却大多是知识问题。无论是近代文学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一二十年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还有后来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中持论大多是源于西方的文本经验，而非现实生命体验。真正有价值的伦理诉求必须根源于深刻的现实体验，而不是知识。就此而言，二十年代前后流行白话文运动和问题小说之所以很快就遭到置疑，实际上一开始就被它的知识性原则决定了。那个时代文坛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主义”，以及作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都非源自中国作家所深切体验

下的现实“主义”和“问题”，而是在西方启蒙伦理概念下的“主义”和“问题”。中国现代作家这种文学伦理诉求的知识化，使他们的写作一开始就被限定在语言，题材和主题的范围之中。文学写作似乎成为一个探索和丰富知识的活动。写作所要面对的现实，似乎就是由这些诸如家族礼教，婚姻，妇女，战争，社会等主题观念构成的现实。即使像创造社这样的以追求直觉，表现自我为文学目的的作家群体，也仍然摆脱不了这个限制。正如被高度评价的郁达夫的作品《沉沦》，现在看来，把它作为一个心理学文本要比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分析会更有价值。

可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为人生服务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是追求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旦涉及到民众灵魂和伦理诉求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苍白无力的，这不能不说中国现代作家的缺陷。据美国作家赛珍珠观察，对现代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新文化运动尽管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真正关心和理解这场运动的却只有全国人数的百分之五。这些新知识分子要革命，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却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崇尚西方文化，却不愿意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和精神根源；他们要求文学为大众服务，但同时俯视自己的人民，把他们当作被教育和拯救的对象。中国知识分子同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现实的生活，而在于他们的语言和概念的优先性思维决定了他们的写作的性质。这种思维方式即使在表述知识分子自己的时候，也难以深入下去。比如，人们常常会以“追求个性自由”的眼光来评价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事实是，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的却是一个未成熟女子的自私和任性，其中难见西方启蒙主义所理解的自由。如果说自由是人类永远谈不完的话题的话，那么，丁玲自己的写作经验证明，在她写作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不久，她就面临着写作危机，以至于到了写不下去的境地。所谓的“个性自由”在她那里不再富有魅力，这并不是因为自由本身有什么错，而在于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西方自由观念的接受一开始就存在问题。

宗教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遭受的苦难越深重，现实感越强，其信仰越坚决，影响越普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遭遇了种种伟大变革，但却未能产生出深刻而普遍的伦理诉求，其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精神隔膜。对缺少现实感的作家，要求其能够在作品中表现

出一种伟大而普遍的伦理诉求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仅仅看到西方国家发达的现代文明，而不顾其发达表象背后的伦理根源，这同样不能给中国现代作家提供真正的伦理诉求。我们知道，支撑西方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基础就是基督教。但正是这个最为基础性的东西，却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再被忽视或者遭到冲击。比如，林好人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就意识到“美人信教至笃，语多以教为宗”。为了中国读者的方便就将其中有关宗教的原文删掉了。<sup>3)</sup>这一事实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作家在吸取西方文学的一种态度。同样，我们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界对于基督教的抵制或者变相的抵制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比如，胡适就高度评价吴智暉的科学主义态度时就曾经指出，“他一笔勾销了上帝，抹煞了灵魂，凿穿了‘人为万物之灵’的玄秘。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们替上帝向吴先生作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灵魂的人们出来替灵魂向吴先生作战。”<sup>4)</sup>另外，提出“以欧化为是”这样决绝口号的陈独秀，对于宗教则要求以科学代之，同样，蔡元培则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这些淡化宗教，乃至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反基督教运动，都深刻的显示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信仰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中国的作家尽管接过了西方启蒙话语方式，但却不自觉的淡化甚至遗忘这些话语背后的信仰论基础，而恰恰是后者才是西方文学的灵魂。卡西尔曾经在他的《启蒙哲学》一书中为我们指出：“我们能否根据启蒙运动的斗士和发言人的上述宣称，就认为启蒙时代的基本精神是反宗教和敌视宗教，这一点就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观点恰恰有忽视这一时代最高的积极成就的危险。怀疑论本身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启蒙运动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不再于它摒弃信仰，而在于它宣告的新信仰形式，在于它包含的新宗教形式。”<sup>5)</sup>卡西尔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在西方的启蒙主义时代，人们其实也并未放弃其超验性的伦理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一以贯之于西方世界的整个传统，即使后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只是重视文化的知识表象，而缺少对文化伦理背景的考察，这是中国

3) 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4) 孙尚扬刘宗坤《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基督教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5) [德]E·卡西勒著《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现代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写作，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和评价。中国作家对巴尔扎克的误读就是一个例子。巴尔扎克作为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对于巴尔扎克，中国作家大多是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定义来理解的。比如郁达夫和茅盾就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是近代写实主义的伟大导师，就在于“他能把他的人物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看得清清楚楚，凡他和她们的生活习惯，嗜好弱点，无不刻画尽致。而他所描写的剧的动作，又纯系由这些人物的对于他们的环境的一如住宅，街市，职业等——和他们的遗传天性及个人相互见的偶然的接触中抽绎出来的事件。”

可以看到，这种现在仍被坚持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强调的是巴尔扎克对于认识社会方面的贡献。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巴尔扎克却只能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社会学家，而对于能够触及人类灵魂的、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并无多大关系。尽管巴尔扎克的确曾经表明他想作巴黎的书记员的野心，但他的作品体现的却绝不是一个书记员的野心。首先，从巴尔扎克自己在写作《人间喜剧》时所表明的，我们看到，他最终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和单个人的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推动力和条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视野是人类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西方人对于巴尔扎克的评价就可以清楚这一点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作品《巴尔扎克》中，以一种不同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来这样评价巴尔扎克到：“他变得成熟之后，在预感到自己的强大力量之时，他想证明：由他这样地位的小说作家理应承担的人物是，通过表现人类最重要的问题——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问题，把小说提高为一种崇高的艺术。他试图把超越常情的人同那些呆在社会之内循规蹈矩、随俗而生的人作个对比。他要塑造真正的领袖人物，塑造那些敢于摆脱常人、甘居寂寞或是把自己关在幻想这个监狱里的那些人的悲剧。巴尔扎克在自己生活中惨遭失败的这段时间同时也是他极其勇敢和极其大胆的时期。在这些作品里，巴尔扎克试图肩负起这样一种使命：着力描写那些给自己提出最高的，其实又是无法解决的任务的人。他的最大努力旨在描写那些由于过度努力而惨遭失败的人，旨在描写那些天才，那些与现实失去联系的人物。……在纯粹小说家和思想家之间，巴

巴尔扎克这位观察家处在中间地位——他的真正立足点是现实。因此，巴尔扎克在那些他变成了‘当代历史学家’中，找到了自己心理的彻底平衡。……现在他发现：只要正确的加以观察，在当代史中同样蕴藏着强烈紧张的生活；重要的问题不再于主题，不在于背景，不在于粉饰，而是在于内在的动力。……人间没有特殊的素材：一切都是素材。……塑造人物就是正确进行观察，就是集中，就是强化，就是挖掘最大量的东西，暴露每个激情者身上的激情，认清强者身上的弱点，唤醒沉睡的力量。”<sup>6)</sup>从茨威格对巴尔扎克的这些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到，巴尔扎克并不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记录员，而是一个力求找到那个决定整个社会的终极本体的探索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并非偶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就把巴尔扎克看作是法国浪漫派的代表，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在他看来，巴尔扎克那种终极探索的精神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他把握住了主宰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因素，那就是金钱和情欲。我们从中外作家对于巴尔扎克的不同评价中，不难看出中国作家在思想结构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向人们呈现出中国现代作家缺乏如西方作家那样的对于伦理的本体论意义上诉求意向，而大多停留在一种社会认知的诉求层面。对于社会关注的关注使中国现代作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题材，主题，技巧和读者身份及需求上，却未顾及文学探索人类灵魂的终极使命。当中国作家还在忙碌着讨论文学为谁写和写什么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巴尔扎克和整个欧洲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注意到巴尔扎克的文学意义。离开了象巴尔扎克那样对于终极原因的探索精神，固然可以产生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好的作品，但是却难以产生那种震撼人类灵魂的伟大作品。好与伟大的不同在于：好的作品只能令人欣赏，伟大的作品却是令人赞叹。如果一个作家如果缺乏超越一切的伦理本体诉求的话，是很难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的。

6) [奥地利]茨威格著《巴尔扎克》米尚志 谭渊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32页。

### 三. 中国现代作家的伦理经验与启示

中国现代作家重知识经验，缺乏强烈的现实体验和伦理本体诉求的结构性缺陷，使他们在最讲究精神解放的时代，却忽视了精神本身的改造。结果常常是，许多有艺术成就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曹禺、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常常不是出现在作家思想的成熟阶段，而是出现在他们思想尚未完全形成的早期阶段。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就在于，他们不是按照既有的思想去写作，而是依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写作，依据一种源自本能的信仰去写作。

今天看来，鲁迅之所以能够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国民灵魂的探索者，而他自身的经验证明，如果不立足于深刻的生活体验，如果缺乏对灵魂世界的深刻探索，那么就难以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所以，当鲁迅抱着西方小说的概念来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满意，相反，最为他重视的却是《孔乙己》，正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达的现代概念最少，但现实的体验却最深。鲁迅创作态度中有别于其它作家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他一开始就自觉的同那种不顾现实疾苦，只顾吟风弄月的文人休闲文学保持着巨大的距离。相比鲁迅的自觉而言，郭沫若划时代意义的《女神》则是在一种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写出的。曹禺的创作则多来源于他的一种生命体验和创作天分。当他创作《雷雨》的时候，他也只是朦朦胧胧的感受到“宇宙中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沈从文算是一个具有抽象信仰，希望“造希腊小庙中的人性”来写作的作家，但这条道路对于他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偶然，在他实际的创作过程中，他更宁愿承认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张爱玲也是一个强调人的神性的作家，但是这种神性却并非超越意义上的，而是指和谐安稳的妇人性。

这些作家的现实体验和不自觉的伦理诉求尽管可以使他们很早就可以创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却难以保证创作水准的一以贯之。常常看到的情况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创作作品的艺术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不断地下降。这除了中国大多现代作家为响应时代和社会

要求的创作动机之外，与作家自身是否具有自觉的，现代化的伦理诉求具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探索国民灵魂的过程中是极其矛盾的，他对灵魂的探索始终和他的虚无主义情绪始终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当他真的在现实中失败了的时候，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后期的小说创作也随之丧失了锐气，从《呐喊》走向《彷徨》的轨迹就是一个证明。郭沫若在他的《女神》，曹禺在他的“生命三部曲”，沈从文在他的以“湘西边城世界”为主的文学作品中，还有张爱玲在她的《传奇》中，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崇拜自然或者金钱物质神力的泛神论的道路。而泛神论，在郭沫若看来，就是无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切自然所见之物都成为自我表现的对象。曹禺对于这种神秘力量的感受本来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在《生命三部曲》之后，他的作品就与一般的描写爱情和阶级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没有多少区分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使他执着的坚持以自然神论，而以此为基础创作出来的湘西世界，尽管看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或者世外桃源，但终因缺少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使作者所描述的世界缺少立体感和力量感。张爱玲尽管不是去探究过于宏大的宇宙自然神力，但却依然呈现出自然神论的倾向，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普遍表现出来的拜物教。她在生活中，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拜金主义者。而在小说中，她也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那些执着于物质的市民身上。她在解释《连环套》中霓喜这一人物故事的时候就指出，“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她对人的神性理解是物质性和“妇人性”。但正因为耽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力量，痴迷于苍凉的美感而未能使人性的力量得到伸张。我们注意到，上述这几位作家，或者在他们创作作品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年轻，或者是天赋，或者是自觉的抵制知识性原则等等原因不一而足，但恰恰都是这些原因使他们创造出了现代文学史上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基本上都赖于他们深刻的现实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基础上生成的伦理诉求。但是，显然，这些作家的伦理诉求大多都是不自觉的，而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使他们的伦理诉求无法在他们的作品中一直坚持下来，并且把它上升为一种创作的自觉。结果，他们不是重新返回到中国古代文人以自然或者社会为对象的伦理诉求，就是放弃文学的

终极伦理诉求，使文学成为自我表现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

上述事实说明，没有自觉的现代伦理诉求，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形成一个创造伟大作品的传统和氛围更是困难。伟大的作品并非只是关乎某一种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而是要关乎人类的精神本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成功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一种自觉的状态。就此而言，如何树立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而普遍的伦理诉求，就成为所有希望创造出伟大作品的现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于人们理解现代文学，而且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的建设，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영문제요》

It is a big problem to the scholars that there was no great works appearing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the thesis indacates that ,since the new culutral moment happened,the chinese mordern write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principles from the western enlighten movement, rather than its ethic background.The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limited deeply the writer's creation.

주제어 : enlightenment knowledge echic demand